

湖南

文史

HUNAN WENSHI

43
1991

湖南志士与辛亥革命

八纪十念周年辛亥专革辑命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第
43
辑

湖南文史

周谷城题

湖南文史杂志社

湖南文史 HUNAN WENSHI 第43辑

编辑/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主编/田伏隆

副主编/丁江 高原

责任编辑/陈永芳

出版/湖南文史杂志社(湖南省长沙市迎宾路15号)

发行/湖南文史杂志社发行部

印刷/湖南省政协机关印刷厂

广告经营许可证湘长广准字第0152号

开本/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7.5 字数180,000 印数12,600

版次/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长沙第1次印刷

国内统一刊号 CN43—1175

定价/3.00元

湖南文史

目 录

(总第43辑)

特 稿

湖南志士与辛亥革命 刘决决 (1)

卓有成效的革命宣传活动——稳健进取的革命组织工作——
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——首应武昌与推动各省独立——维护
民主重建共和——可贵的精神与作风

辛亥革命时期的毛泽东 赵志超 (26)

第一次发表政见——“许多人里的一个小卒”——参加湖南
新军
游首义旧址，忆先烈伟绩

——追思湖南革命党人对武昌首义的重大贡献
..... 高士振 高士福 李腊梅 (32)

辛亥风云录

辛亥革命的回忆 草 据 (39)

新军是武汉起义的基本力量——武汉起义为革命赢得了宝贵
的时间

我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一段经历 戴凤翔 (45)

萍浏醴和安庆起义——长沙光复之役——焦陈二督被杀之内
幕——汉阳保卫战

湖南辛亥光复事略 熊光汉 (52)

革命之动机——天心阁会议——革命进程中之打击——川粤
汉铁路收归国有之反响——清水塘会议——焦达峰回湘主持
军事——贾太傅祠会议——九月一日之举义——湖南光复后
之状况——援鄂之役

- ZA39/67
- ▽ 长沙光复前后见闻录 龙铁元 (61)
 - ▽ 长沙光复身历记 王哺苏 (65)
 - ▽ 参加辛亥革命的片断回忆 陈炳南 (70)
 - 湖南辛亥逸事 朱运鸿 文 碩 林 绚 祜 彭肇藩 (72)
湖南咨议局的二幅对联——长沙光复中的小波折——杀害自立军烈士凶手的下场——禹之谟好友陈荆佚闻

会党与辛亥革命

- 马福益与哥老会甲辰起事 廖瑞星 (76)

湖南辛亥志士

- ▽ 湘籍辛亥人物小传 周秋光 高 原 陈永芳 陈 滨 (82)
- ▽ 记焦达峰身边的六位辛亥志士 焦传爱 周学奔 (146)
业师黎尚姜——拳师江庇佑——盟兄黎先诚——总角之交周海文——难兄刘肯堂——同学黄小山
- 同盟会女志士张汉英传略 陆承裕 (167)
家世与童年——留学日本——夫妇加入同盟会——营救李发群出狱——力争女子参政权载入约法——首创醴陵女子学堂——遗诗四首
- 忆胡星池二三事 黄时英 (173)
- 我所知道的谭二式 康乐英 (179)
- 潘鼎新黄荣与华容义军 潘浩然 (182)
- 陆军中将程子楷将军传略 资兴市政协文史委员会 (186)
- 南京临时政府内务司长张通典传 张式弘 (191)

历史资料

杨毓麟家书十五通

- 附章生钊、杨德邻诗书八篇 (197)

湖南志士与辛亥革命

刘 汲 汲

“惟楚有材，于斯为盛”。翻开辛亥革命史册，湖南志士的名字耀人眼目。李新、任一民编的《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人物》，收录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23人，其中湖南籍的6人，即黄兴、陈天华、禹之谟、宋教仁、蒋翊武、焦达峰，占总数的26%强。大型辞书《辞海》《中国近代史》分册收录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47人，其中湖南籍的13人，占27.6%，这13人依次是：秦力山、黄兴、宋教仁、陈天华、杨卓霖、龚春台、蒋翊武、焦达峰、陈作新、禹之谟、谭人凤、宁调元、蔡锷。章开沅、林增平主编的《辛亥革命史》书后附了一个人名索引，粗略统计，属于革命派者约300余人，其中湖南籍的50余人，约占16%。从具体历史事件说：1904年，中国留日学生总数2408人，其中湖南籍的363人①；1905年7月30日，孙中山、黄兴在日本东京召集同盟会筹备会，与会的共79人，其中湖南志士20人②；1905—1907年，同盟会东京本部登记入册的会员共960人，其中湖南籍会员156人③；武昌首义后，各省纷起独立，称都督者凡25人，其中湖南籍的7人。这些，均属独占

①据《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书》。

②据郭汉民：《同盟会‘非团体联合’史实考》，见《麓山论史 草编》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。

③据冯自由：《革命逸史》第6集，《中国同盟会最初三年会员人名册》，中华书局1981年版。

鳌头。

为什么辛亥革命时期湖南志士如此群星灿烂，引人瞩目？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因素，而是由于湖南志士在辛亥革命中作出了实实在在的卓越的贡献，从而获得了人民群众的公认，历史的公正的肯定。以下我们便就湖南志士在辛亥革命中的主要贡献作些论述，并探讨一下他们卓著勋绩的原因。

卓有成效的革命宣传活动

湖南志士投身革命是从革命宣传活动开始的，并且一以贯之，坚持不懈，对推动辛亥革命高潮的到来起了巨大的作用。1901年5月，秦力山等在日本东京创刊《国民报》月刊，该杂志以“唤起国民精神”为宗旨，“大倡革命仇满学说，措词激昂，开留学界革命新闻之先河”^①。1902年11月，黄兴、杨毓麟、樊锥、梁焕彝等在日本东京创刊《游学译编》杂志，稍后组织“湖南编译社”，以译文为主，兼刊创作，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及其革命史，宣传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思想。其第10期刊载《民族主义之教育》一文，写道：“权衡今日支那民族时势之轻重，事业之缓急，莫如革命。革命者，今日支那民族最大之幸福也；民族主义，则求此最大幸福之引线也。”1903至1904年，杨毓麟所著《新湖南》一书先后在东京和上海出版。该书主旨批判康有为、梁启超等的保皇言论，论证反帝必先反清，号召推翻清朝统治，鼓吹湖南脱离清政府独立。特别可贵的是，杨毓麟在书中历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，从本质上揭露它所采取的“殖民政略”等种种手段，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，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所能达到的最深刻的认识。继杨毓麟之后，陈天华陆续撰写出版了《猛回头》、《警世钟》、《狮子吼》等作品。他的作品，紧扣时代主题，

^① 冯自由：《革命逸史》初集，《东京《国民报》》。

思想内容深刻，表现了强烈的反帝爱国激情和鲜明的民主革命思想。其中关于清政府已沦为“洋人的朝廷”的论断，关于“革命者，救人救世之圣药也”的名言，脍炙人口。还有一个显著特点：“所著咸用白话文或通俗文，务使舆夫走卒皆能读之了解。”因而，“其文字小册散播于长江沿岸各省，最为盛行，较之章太炎《驳康有为政见书》及邹容《革命军》，有过之无不及。”①被誉为“革命党之大文豪”②。民国成立后，孙中山缅怀先烈，在一个批文中特别提到：陈天华“发愤著书，凡数十万言，皆发扬民族之精义，至今家有其书。此次义师一呼（按指辛亥革命），万方响应，实由民族学说灌输人心，已匪朝夕，故铜山崩而洛钟应，光复大业，期月告成。”③

1905年6月，宋教仁在日本东京艰辛筹办的《二十世纪之支那》杂志正式出版。该刊宣传爱国主义，鼓吹反清革命，言词激烈。第2期因刊载《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》等文，触犯日本当局，遭到查封。但不久同盟会成立，在成立大会上，经黄兴提议，与会者一致同意，将该杂志转为同盟会机关刊物，改名《民报》，继续出版发行。宋教仁仍担任庶务兼撰述员，陈天华、黄兴也在刊物发表多篇文章，继续以踔励奋发的姿态，出现在宣传阵地的前沿。1906年10月，宁调元、傅熊湘等在上海创刊《洞庭波》杂志，揭露清廷苛政和伪立宪丑行，讴歌民主自由，宣传反清的民族革命思想。宁调元曾发表《感怀》诗云：“十年前是一童囚，也逐欧风唱自由。……愿播热血高万丈，雨飞不住注神州。”④次年1月宁调元被捕后，《洞庭波》改组为《汉帜》，转移到日本东京刊行，由陈家鼎、仇亮等主编，继续宣传反清的民族革命思想。1907年春，杨毓

① 冯自由：《革命逸史》第2集，《猛回头作者陈天华》。

② 曹亚伯：《武昌革命真史》前编，第25页，中华书局1927年版。

③ 见《孙中山全集》第2卷，第183页，中华书局1982年版。

④ 见《洞庭波》第1期。

麟协同于右任在上海创办《神州日报》，于任社长，杨任主编，主持笔政。该报不用清廷正朔，采干支纪年，“用旁敲侧击之文字，以作迂回之宣传”①，实则“极力鼓吹革命，直诛政府之专制，痛陈种族之灭亡”②。1911年1月，宋教仁应于右任邀，担任上海《民立报》主笔。他以“渔父”的笔名，在该报撰刊了上百篇政论与时评文章，深刻揭露民族危机，尖锐抨击清廷苛政，批驳立宪派否定革命的谬论，并对国际局势的变化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形势作了透辟的分析，深受读者欢迎，对于推动革命高潮的到来起了巨大作用。冯自由曾经写道：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“虽不幸失败，《民立》、《神州》二报反借此宣传民族主义，鼓荡革命精神，竞载殉义烈士之嘉言轶事，如数家珍。遂令全国之革命思潮，有黄河一泻千里之势。是岁八月，武昌首义，不数月而各省络绎响应，清祚以亡。则两报文字之功，为不可没矣。”③这里，还应当提到何海鸣在《大江报》的活动。《大江报》为文学社的机关报，主编和发行人是詹大悲，何海鸣担任编辑。1911年7月，《大江报》发表了何撰写的短评《亡中国者和平也》，8月，又发表了黄侃执笔的社论《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》，公开号召革命。詹、何虽因此被捕入狱，但这些宣传显然对武昌起义的爆发起了推动作用。

稳健进取的革命组织工作

辛亥革命的领导政党是以孙中山为总理，黄兴任执行部庶务的中国同盟会。而作为同盟会的前身，也主要是孙中山手创的兴中会和黄兴领导的华兴会。如果说，1894年兴中会的创立

① 冯自由：《革命逸史》第2集，《上海（神州日报）小史》。

② 冯自由：《革命逸史》第2集，《（新湖南）作者杨笃生》。

③ 冯自由：《革命逸史》第3集，上海《民立报》小史》。

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诞生，那么，1903年华兴会的筹建，则是中国内地最早的革命组织。比较一下这两个组织是颇有意思的。两会一名“兴中”，一名“华兴”，显然都寓有“振兴中华”的意思。二会宗旨亦大体相同，均以推翻清王朝，建立共和国相号召。兴中会始创于1894年，早华兴会9年，然而，华兴会在国内的基础，较之兴中会要深厚广泛得多。据统计，兴中会在其存在的10年间，会员总数不超过500人，而有名籍可考者，不过286人。这286人中，按其居留地分布说，夏威夷群岛138人，旧金山1人，日本27人，越南8人，南非12人，广东59人，英国割占的香港31人，尚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3人，另日本人7人。合计海外华侨186人，占总数的65%强；如果再加上香港、台湾的34人，为217人，占总数的75.87%。而在中国大陆者，仅59人，占总数的20.6%，且限于广东一省①。又据统计：1894至1895两年中，参加兴中会有名籍可查者计178人，其中商人96人，工人39人，农牧业者6人，自由职业者9人，公务员10人，水师官员4人，学生2人，会党12人；所以这些会员，79%是华侨②。而华兴会，虽然它只存在不到两年时间，而会员人数和联络人员要多得多，且广泛分布于中国腹地、大江南北。有人估计，仅两湖地区的革命知识分子入会者，便有四、五百人，其它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福建、直隶、广东、四川、江西、贵州，均有列名加入者③。还有一个情况：兴中会自广州、惠州二次起义失败后，“党中健将……先后断丧，元气实力为之大伤”④，孙中山奔波海外，迄1905年以前，对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巨大作用还认

① 据冯自由：《革命逸史》第4集，《兴中会会员人员事迹考》。

② 章开沅、林增平主编：《辛亥革命史》上册，第90页。

③ 姬春发：《华兴会始末》，见《辛亥革命在湖南》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。

④ 冯自由：《革命逸史》第2集，《中国同盟会史略》。

识不足，与留日学生革命团体尚未建立多少联系。而华兴会，它的领导人原多为留日学生，其时虽也经历了长沙起义的失败，革命骨干基本上没有受到重大损失。大批会员逃至日本东京，在留学界鼓吹革命，广事联络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“留东青年，以黄兴为革命实行家，多倾向推重。益以张溥泉、宋教仁、陈天华辈为之结纳，黄可操东京革命志士之牛耳。”①如此种种，不能不对1905年秋同盟会在东京的成立及其以后的发展，产生深刻的影响。

在同盟会成立过程中，以黄兴为首的湖南志士起了重大的作用。关于参加筹备会的人数，湖南志士首屈一指，前已述及。可为补充的是：在与会的20名湖南人中，不少为原华兴会成员，如黄兴、宋教仁、陈天华、刘道一、柳扬谷等。1905年8月20日，同盟会召开正式成立大会，决定东京本部的人事安排。经黄兴提议，大会通过，孙中山担任总理；以下执行、评议、司法各部，职员凡25人，湖南居4人，占16%。其中黄兴直接由孙中山指定为执行部庶务，居协理地位；宋教仁任司法部检事长；范治煥、胡瑛被评选为评议员。②

同盟会成立后，湖南志士除积极在本省和外省（如宋教仁赴安东建立同盟会辽东支部）建立组织、发展会员外，在组织建设方面，还有两个方面的突出贡献：一是维护同盟会的团结，捍卫孙中山的领袖地位；二是从实际出发，发展组织，使组织形式更好地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。总之，既坚持革命原则，又发挥革命主动性和首创精神。

1907年以后，同盟会领导层由于经费分配等问题和某些政见分歧，多次发生争端，风波迭起。少数人公然把矛头指向孙

① 左舜生：《中国近代史四讲》，香港友谊出版社1962年版，第283页。

② 见邹鲁：《中国国民党史稿》，中华书局1960年版，第一篇，《中国同盟会》。

中山，要求罢免孙中山，分裂同盟会。黄兴与一度代理庶务的刘揆一等，顶住了这股逆流，力挽狂澜，始终维护革命队伍的团结，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。黄兴恳切地告诫东京会员说：

“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，而非个人名位问题。孙总理德高望重，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，乞勿误会，而倾心拥护，且免陷先生于不义。”①义正词严地拒绝了某些人想抬他出来取代孙中山的错误做法，并严厉地驳斥了他们对孙中山的诬蔑和攻击。刘揆一在极其艰困的条件下坚持本部工作，甚至遭到辱骂和殴打，也不向反孙的分裂潮流屈服。

1907年，长江流域会党活动较为活跃，同盟会新设联络部，专以联络各省秘密会党为宗旨，焦达峰任调查部长。于是，他联络川人张百祥、赣人邓文翬、鄂人刘公等，组织“共进会”，“作为同盟会之外围”②，以推进长江流域革命。黄兴获知此事后曾责问焦达峰“何故立异”？焦答：“同盟会举趾舒缓，故以是赴急，非敢异也。”黄亦“爽然”不加阻难。③后共进会果然与文学社一道，成为武昌起义的领导组织之一。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，同盟会东京本部人士多感灰心，谭人凤、宋教仁等力图将革命的重心转到长江流域，于是有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之议。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，各地党人纷纷集聚上海。谭人凤、宋教仁乃与长江各省党人陈其美、杨谱笙、潘祖彝等反复磋商，7月末，在上海北四川路湖州公学召集会议，酝酿已久的同盟会中部总会终于宣告成立。在参与成立会的29人中，湖南志士占7人，即谭人凤、宋教仁、曾杰、李治、梁鑒、谭毅君、陈道。并由谭人凤起草宣言，宋教仁起草会章。议定“奉东京本部为主体，认南部分

①《黄兴集》，中华书局1981年版，第7页。

②冯自由：《革命逸史》第5集，《共进会长张百祥》。

③章太炎：《焦达峰传》，见《太炎文录续编》卷四。

会为友邦”。总会设总务干事5人，由谭人凤、宋教仁、陈其美、杨谱笙、潘祖彝担任，推谭人凤为总务会议议长，谭人凤、宋教仁并分别掌理交通、文书部①。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，派员分赴各省组织分会，并促成武汉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，推动了长江各省特别是两湖地区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。其时远在香港的黄兴，对谭人凤、宋教仁等建立同盟会中部总会的积极进取精神，也是热情赞许的。他复信说：“欣悉列公热心毅力，竟能于横流之日，组织干部，力图进取，钦佩何极！迩者，蜀中风云激发，人心益愤，得公等规画一切，长江上下自可联贯一气，更能力争武汉。老谋深算，虽诸葛亮复生，不能易也。光复之基，即肇于此，何庆如之！”并表示要“从公等后以谋进取”②。又在《和谭人凤》诗中写道：“怀锥不遇粤运终，露布飞传蜀道通。吴楚英豪戈指日，江湖侠气剑如虹。能争汉上为先著，此复神州第一功。愧我年来频败北，马前趋拜敢称雄？”③无论是共进会还是中部同盟会，当时在同盟会内部颇有异议。黄兴一贯以忠厚稳慎、维护团结、顾全大局著称，为什么会容忍共进会而又赞许中部同盟会呢？这无非是为着使革命的组织形式更好地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。这点，他在武昌起义前夕致冯自由的信中说得很清楚。他说：四川保路风潮骤起后，湖北“各主动人主张急进办法，现殆有弦满欲发之势。……似此人心愤发，倚为主动，实确有把握，诚为不可多得之机会。若强为遏抑，或听其内部自发，吾人不为之指挥，恐有鱼烂之势，事诚可惜。……急宜趁此机会，猛勇精进，较之徒在粤谋发起者，事半功倍。”④

① 见邹鲁：《中国国民党史稿》第一篇，《中国同盟会》。

② ③④《黄兴集》第63、71—72、66—67页。

应当说，以黄兴为首的湖南志士，在革命组织工作中，扎实肯干，既维护团结，又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做法，有益于革命事业发展。

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

辛亥革命是以暴力革命为主要形式，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主义统治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。在辛亥革命时期，黄兴是革命武装斗争的主要领导者，领导反清武装斗争，屡蹶屡起，直至胜利，构成他生平最主要的业绩。其他许多湖南志士，也都在革命武装斗争中作出过卓越的贡献，有些并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。

还在同盟会成立前，湖南志士就多次向清朝统治者进行过武装斗争。1900年以两湖和安徽为主的自立军起义，是湖南志士唐才常、林圭和秦力山等领导的。起义失败，唐才常、林圭、田邦璇、蔡钟浩、沈荩等一大批志士先后被捕牺牲。“江汉悲深记后先，神州光复倍凄然。”^①黄兴悼念林圭的这首诗，将自立军起义与直接导致推翻清王朝的武昌起义联系在一起，寓意是非常深刻的。1904年，黄兴、刘揆一、宋教仁等创立华兴会后，即联络会党，规划在长沙等地发动武装起义。谋泄事败后，著名会党首领马福益等先后遇难。这次起义虽告流产，但黄兴、宋教仁、刘揆一等一大批湖南志士从此走上武装革命的道路。

同盟会成立后，革命武装斗争迅速发展。1906年冬爆发的规模巨大的萍浏醴起义，是同盟会成立后第一次群众性武装起义。它是在黄兴主持与策划下发动的。直接领导这次起义的，是受黄兴派遣回国的年轻同盟会员刘道一、蔡绍南（江西人）。

^①见《黄兴集》。

以及业已加入同盟会的会党首领龚春台等。起义爆发后，黄兴又派出杨卓霖、李发群、宁调元、胡瑛以及孙毓筠等回国，分赴长江流域各省谋响应。起义失败，刘道一、杨卓霖等壮烈牺牲。“半壁东南三楚雄，刘郎死去霸图空。尚余遗孽艰难甚，谁与斯人慷慨同？塞上秋风悲战马，神州落日泣哀鸿。几时痛饮黄龙酒，横揽江流一奠公。”①以孙中山名义撰写的这首《挽刘道一》诗，对萍浏醴起义烈士给予充分的肯定。1907年后，黄兴亲自奔波华南，身临前线，接连领导了多次武装起义。1907年9月，钦廉防城起义爆发，他事先潜入钦州清军统领郭人漳营内，谋策反未成。同年12月，镇南关（今友谊关）起义继起，他随同孙中山亲身参加战斗。1908年3月，他又发动了著名的钦廉上思起义，率200精卒，抗击清军两万之众，历时40余日。孙中山后来曾多次提及此役，并给予以黄兴为代表的湖南志士高度的评价。1924年2月，在对驻广州的湘军发表演说中称：“湖南老革命党，最著名的有黄克强。他有一次自安南入钦廉起义，当时到钦廉来抵抗革命党的清兵，有两万多人。黄克强带的革命军不过两百人，所有的武器不过两百枝枪，用那样少的人，和那样多的清兵打两个多月仗，到后来弹尽而援不至，还可安全退出。照这一次战事说，革命军就是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。象这样的战斗，是非常的战斗，不可以常理论。象这样不可以常理论的事，还是你们湖南人做出来的。”②经此次战役，黄兴的“威名因以大著”③。同年5月，他还参加过云南河口起义，节制河口起义诸军。

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，是震惊全国的重大事件。这次起义，先经孙中山、黄兴等多方策划，欲“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，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”④。由黄兴担任统筹部部长，筹

① 见《革命先烈传记》，第265页，1941年版。

②③④ 《孙中山文选》第882、204、207页。

划起义具体事宜。湖南志士谭人凤、宋教仁等纷纷由上海赶赴香港，李燮和、陈方度等亦应邀由南洋奔来。宋教仁担任编制课长，负责起草起义布告令文，并准备起义胜利后的约法和政府组织方案。黄兴在起义中，身先士卒，亲率敢死队直扑两广总督署，勇猛冲杀，虽被敌弹击断右手食、中两指，仍顽强坚持战斗。这次起义虽然不幸失败了，但在全国起了极大的革命激励作用；同时，黄兴等于起义前布置长江各省响应事宜也收到了积极的效果。正如孙中山所说：经过这次起义，“全国久蛰之人心，乃大兴奋。怨愤所积，如怒涛排壑，不可遏抑，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”^①。

武昌起义及随后的武汉保卫战，是辛亥革命运动的高峰，也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大决战。在这关键时刻，湖南志士的杰出作用是有口皆碑的。这里，我们只须依次举出以下的名字，就足以表明湖南志士的举足轻重的作用：文学社社长、武昌起义总司令蒋翊武，革命总指挥部参议、武昌首义三烈士之一刘复基，先后任湖北民军总司令、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黄兴，《鄂州约法》起草人宋教仁，鄂军政府外交部长胡瑛，武昌防御史兼北面招讨使谭人凤，等等。其中，蒋翊武等直接发动和领导的武昌起义，打响了全国革命的第一枪，是辛亥革命史上第一场胜利的起义；而黄兴、谭人凤等领导的武汉保卫战，则不仅捍卫了首义之地武昌，更重要的是在于为革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，并吸引了大批清军主力，为其它各省纷纷独立创造了有利条件，从而，最终迎来了清王朝的覆亡和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诞生。所以，当有人对黄兴汉阳保卫战妄加贬斥时，老同盟会员居正却能结合当时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给予正确的评论，他说：“故克强之功，不在守汉阳之孤城，而在其大无畏之精神，以未经教练之乌合残卒，含辛茹苦，抵抗

① 《孙中山全集》（四）序文，第16页，上海广益书局1929年版。

冯国璋北洋熟练之雄师，因此稳定起义之武昌，促各省革命党之崛起。……使武昌起义仅如昙花一现，则各省亦无从继起矣。阳夏之艰苦支持，自不得不归功克强”。①

首应武昌与推动各省独立

还在1904年春华兴会成立之时，黄兴就提出“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”②为革命进行之方针。这里说的“一省”当然首先是指湖南。以此为基地，推动各省“纷起”，最后夺取全国胜利。所以，华兴会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省区性的团体，它的会员既包括众多的籍贯，又分散在各省活动。此后，湖南志士一直抱着立足本省，面向全国的胸怀，推进革命事业。湖南和湖北由于地理位置（毗邻）、行政区划（同属湖广总督所辖）、历史文化（楚文化）等项原因，两省的关系特别密切。两省革命党人始终怀着唇齿相依、休戚与共的情谊，把湖南与湖北革命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对待。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，两湖革命党人就召开联席会议，湖北孙武提议：“现在广州既已无望了，自应由我们两湖首先起义，号召各省响应。”湖南焦达峰立即表示：“就从我们两湖干起来，再不要依赖别处了。”从而一致议决：“中国革命以两湖为主动，如湖北首先起义，则湖南即日响应；湖南首先起义，则湖北即日响应。两省同时起义当然更好。”③

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，湖北地区占了“先着”。以焦达峰、陈作新为首的湖南革命党人急起直追，按照预定计划，抓紧部署行动。10月22日，长沙新军起义，建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，焦达峰、陈作新被举为正、副都督。这样，

①居正：《辛亥札记》。大东书局1945年版，第58—59页。

②《黄兴集》第2页。

③见杨玉如：《辛亥革命先着记》，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，第35—36页。